

列代名人詩文選註

韓愈文選

李笠
選註

李笠選

韓愈文選

上海北新書局出版

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再版

韓愈文選

實售

選註者

李

笠

發行人

李

小

峯

北

新

書

局



總發行所
上
四
明
海
林
森
路
西
安
成
都
重
慶
洛
陽
北
新
書
局

緒說

唐代文學

魏晉南北朝，文是由散入駢的時代，隋唐後則是由駢歸散的時代。

自北魏蘇綽倡復古之議，作大誥，因習俗漸染既深，沒有能改變風氣。隋文帝時，李謾上書論文體，痛斥齊梁文風之弊，獲得了文帝的同情，於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，並宜實錄。但文壇風氣有時不是強迫所能挽回。平陳以後，南方文士紛紛北來，兼以煬帝的崇尚浮靡，改革之風，不久即又消滅。故初唐後，無論詩與文，都承梁陳之習，唐書文藝傳序謂唐文章凡三變，蓋以王楊爲一變，燕許爲一變，韓柳爲一變也，羣書備考承其說有云：

王楊始霸，如麗服靚妝，燕趙歌舞，雖綺麗盈前，而殊乏風骨。燕許既興，波瀾頗暢，而駢儻猶存。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倡，柳宗元翼之，豪健雄肆，相與主盟當世。下至孫樵杜牧，峻峯激流，景出象外，而窘裂邊幅。李翹劉禹錫，刮垢見奇，清動可復，而體乏渾雄。皇甫湜白居易之簡質，每見回宮轉角之旨，隨時間作……

從這一段話裏，極可看出唐代文體之變。唐代散文，雖不如詩壇之盛，但是中國散文的革新運動，在唐代是第一次。

由四傑到韓柳

初唐四傑，在詩一方面繼承六朝，其文亦然，純然沿襲六朝駢麗風格，而其工整且有過之。四傑中能文者以王勃楊炯爲著。駱賓王傳稱：「他日崔與張說評

勃等，謂文章宏放，非常人所及，炯照鄰可以企之，說曰；不然，盈川（楊炯曾官婺州盈川令）文如懸河，酌之不竭，優於盧而不減王，恥居後信然，愧在前謙也。」四傑中之能文者，即在唐代作者眼中亦推王楊二人，宋洪邁容齋四筆云：

王勃等四子之文，皆精切有本源，其用駢麗作敍絕碑碣，蓋一時體如此。

蓋唐初文章，未脫陳隋舊習，故四傑作風，仍沿當時體格。自陳子昂出，始發憤自爲，今觀其集，惟諸表序猶沿排偶之習，若論事書疏之類，漸疏樸近古，及開元初，燕許角立，始有渾茂之製，風氣一變。同時李邕亦善爲碑誌，杜甫八哀詩所稱「碑板照四裔」者也。

唐文亦如詩，四傑之後，陳子昂始起而變之，及燕許繼作，猶雜駢麗之辭

至於蕭李出，而後古文之規模始具。

與蕭李同時，而詩文並於當時異者又有元結，後世亦稱其古文，以爲先於韓愈者也。結字次山，河南人。少不羈，年過十七，乃折節向學，今所傳次山集十卷，蓋後人摭拾散佚而編之，非其舊本。結文章戛戛自異，變排偶綺靡之習，晁公武謂其文始古鐘磬，不諧俗耳。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。蓋唐文在韓愈以前，能毅然自爲者自結始。

韓柳的復古運動

唐代古文運動，首推昌黎韓愈，而其端緒則開自蕭李諸人，皆韓氏之先河，其功不可沒也。不過，在散文方面獲得最大的成功者當然首推韓柳，所以後來唐代散文的興起，歸功於韓柳。

愈字退之，鄧州南陽人，三歲時，隨伯兄會官嶺表，嫂鄭氏鞠之，愈自知讀書，通六經百家諸子，舉進士第。後官至吏部侍郎。

每自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、太史公、劉向、揚雄後，作者不世出，故探究原，卓然樹立，成一家言。其文奧衍宏深，沛然不可禦，造端置詞，要皆不蹈襲前人，從愈遊者如孟郊、張籍，亦皆有名於時。門下李翹、李漢皇、甫湜等從而效之，皆不及遠甚。

昌黎對於文學的運動，其異於前者，就是他不單從小地方——文章體裁——着手，他不但注意外形的復古，而且注意到文章的所以形成，能向源頭上用力，這是他在文學運動異於前人的地方。

講到文學的所以形成，不能不回溯到思想方面的變化，漢代是儒家統一的時代，魏晉是黃老漸盛，道家與儒家中分天下的時代。六朝以後，佛又盛行於中

土，於是成了鼎立而三的局面，至唐代後而三教並隆。唐代尊老子，而釋氏諸宗亦漸備於中土，故道教佛教在唐代時爲盛。然對於儒家亦極推崇。唐初之修五經正義後世言經學者宗之，而唐代相臣亦多當時名儒，此爲儒家在歷史上再次伸張其勢力的時候。韓昌黎之推崇六經，痛斥佛教，即爲最有力之表現，所以他說：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視，非聖人之意不敢存。」他的進學解中自周誥殷盤下一段文字，是他自道文學的出處。

他既主張以六經之文爲倡，所以說：「爲文宜師古聖賢人」（答劉正夫書）不但師其文，而且要師其人，所以他極注意於文學的修養，「養其根而俟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遊之詩書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。」他是怎樣的本末並重，想在肥沃培養中，開出燦爛輝煌的花；所以，昌黎在文學的改革上，是開導的一員大將，在道佛並盛的時代，是儒家一位護法功臣。他的文

章雄肆奇絕，尤其所長者則爲傳記敍事一類文字。

至於他的地位到了蘇軾的韓文公碑出，遂成了千餘年來的定論；

匹夫而爲百世師，一言而爲天下法，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，關盛衰之運。自東漢以還，道喪文弊，歷唐貞開元而不能救，獨公談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從公，復歸於正，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，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？

韓愈的文學觀

他的論文主張，抱定隨波逐流者不傳，特立獨行者傳。與世浮沈者不傳，能自樹立者傳。我們看他答劉正夫書所言。

夫百物朝夕所見者，人皆不注視也。及覩其異者，則共觀而言之。夫文，豈

異於是乎？漢朝人莫不能爲文，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。然則用功深者，其收名也遠。若皆與世沈浮，不自樹立，雖不爲當時所怪，亦必無後世之傳也。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，然其所珍愛，必非常物。夫君子之於文，豈異於是乎！

今後進之爲文，能深探而力取之，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，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，必自於此，不自於循常之徒也。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，用則必尚其能者。能者非他，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。（韓昌黎集十八）

『能自樹立不因循』即是他的特性，原來他的文學批評所以欲一反當時風尚者，不外欲不循常而已。欲不循常而其道無由，於是取法於古。取法於古則不隨俗矣。不隨俗則能自樹立矣。能自樹立而猶不因循，不甘暴棄，則『用功深者其收

名也遠。」所以這樣的取法於古，是革新而不是反舊。而這樣的爲當時所怪，也是特出流俗，而不是背道而馳。惟「異」，纔可以進於「能」；亦惟「能」，纔可以稱其「異」。其作品之能成功者在是，其批評之有價值者也在是。

他的論文主張雖重在宗經則古，而同時也兼主明道。其進學解云：

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；記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鈎其元，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。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以窮年。先生之業，可謂勤矣。瓶排異端，攘斥佛老，補苴罅隙，張皇幽渺。尋墜緒之茫
茫，獨旁搜而遠紹；障百川而東之，迴狂瀾於既倒。先生之於儒，可謂有勞矣。沈浸醸郁，含英咀華，作爲文章，其書滿家。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。周誥殷盤，佶屈聱牙。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。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。下逮莊騷太史所錄。子雲相如，同工異曲。先生之於文，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。

矣。（韓昌黎集十二）

這段自述，至爲重要。可爲韓愈用力於文之證，亦可謂韓門設教之方。他是這樣傳道授業，二者並重的，所以他的教人，雖重在文，而不離於道。他以爲爲什麼要學文？就因爲道。如云：

愈之所志於古者，不惟其辭之好，好其道焉爾。（答李秀才書）

愈之爲古文，豈獨取其句讀，不類於今者耶？思古人而不得見；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。通其辭者，本志乎古道者也。（題歐陽生哀辭後）

他又以爲什麼要作文？也因爲道。如云：

讀書以爲學，續言以爲文，非以誇多而鬥靡也。蓋學所以爲道，文所以爲理也。苟行事得其宜，出言得其要，雖不吾面，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。（送陳

秀才序）

這樣爲道而學文，爲道而作文，所以有類於道學家的主張了。

韓愈對於文與道的態度與道學家不同。韓愈是因文而及道，道學家是求道而忽文。一個是體會有得，一個則得魚忘筌。韓愈答劉正夫書云：

或問爲文宜何師？必謹對曰：「宜師古聖賢人。」曰：「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，辭皆不同，宜何師？」必謹對曰：「師其意不師其辭。」又問曰：「宜易宜難？」必謹對曰：「無難易，唯其是爾。」

這正是他因文及道的一種說明。在當初，不過爲文師古聖賢人而已，其後始進到師其意不師其辭。能師其意則能辨其是非，而於道也自然有所得了。這種態度，在道學家看來是倒學，因爲所謂「師其意」云者正不必爲了「爲文」的緣故。

這猶是說「爲文」所下的工夫。待到既有所得，發而爲文，則「爲文」的作用，在道學家看來是載道，在古文家說來是明道。載道則文是道的工具，明道則

文是道所流露。這是作文而歸於道的工夫。所謂『卒澤於仁義道德，炳如也』。

韓愈答尉遲生書云：

夫所謂文者，必有諸其中，是故君子慎其實，實之美惡，其發也不揜，本深而末茂，形大而聲宏，行峻而言厲，心醇而氣和，照晰者無疑，優游者無餘，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；辭不足不可以爲文。（韓昌黎集十五）

一方面因文而及道，一方面作文而歸於道，這是他的文道合一說。

明白他的文道合一說，然後可以進窺他的論文之精義。其送高閑上人序云：

苟可以寓其巧智，使機應於心，不挫於氣，則神完而守固；雖外物至，不膠於心。堯舜禹湯治天下，養叔治射，庖丁治牛，師曠治音聲，扁鵲治病；僚之於丸，秋之於奕，伯倫之於酒，樂之終身不厭，奚暇外慕！夫外慕徒業者，皆不造其堂，不墮其裁者也。（韓昌黎集二十一）

這一節話頗為重要。姚鼐古文辭類纂謂『韓公此言，本自狀所得於文事者。』曾國藩求闕齋日記更為闡發之云：『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；莊子養生主之說也。不挫於物，自謙之候也；孟子養氣章之說也。不挫於物者，體也，道也，本也；機應於心者，用也，技也，末也。韓公之於文，技也進乎道矣。』這些話都極恰當。

確可用以自狀其所得於文事者，確也可看出他論文主張之融合莊孟二家而治於一爐。因為這正是所謂『能自樹立不因循』的注解。不挫於物則能自樹立矣；機應于心，則又正從不因循得來。一以見信道之堅，一以見學文之功，所以此文雖是指書法而言，而其理却可通於文藝。如其不信，請再看他的答李翊書一文。他說：

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。養其根而俟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暉；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

也。

抑又有難者：愈之所爲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！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；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；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戛戛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如其非笑之爲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，然後識古書之真僞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。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汨汨然來矣。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爲喜，譽之則以爲憂，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

吾猶懼其雜也，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游之乎詩書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